

doi:10.3969/j.issn.1671-9247.2018.02.012

桐城才女方令孺“家”的困境与突围策略

汪黎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桐城才女方令孺身处父权制家族和夫权制家庭的双重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她寻觅着可行的突围路径:求学求职、邂逅爱情、扩大社交、融入时代。方令孺的突围策略为进一步研究民国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方令孺;父权制;夫权制;突围路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47(2018)02-0044-04

“Hom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y of Tongcheng Talented Woman Fang Lingru

WA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HUT, Ma'anshan 243002, Anhui, China)

Abstract: Tongcheng talented woman Fang Lingru was in double dilemma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and patriarchy family.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she pursued feasible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achievement in the aspect of job, love, social contact and era of integrat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Fang Lingru; patriarchal clan; patriarchy family; breakthrough strategy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是宁静的港湾和人的精神归宿。人类想有家,就如“鸟有巢,兽有穴,蜜蜂有窠,蚂蚁有地底的城堡”那般自然^[1]。出于柔弱的天性、伟大的母爱和长期操持家务的历史文化积淀,女性对温馨家庭的渴望胜于男子,因而,古今中外,在女作家笔下,“家”的情结是难以割舍的。当关于“家”的理想与现实冲突时,女性又如何走出困境,寻求新的出路,这是女性解放漫漫路上的永恒话题。1936年,有人以“家”为题向方令孺(与林徽因同为新月派著名女诗人)约稿,方令孺心头沉甸甸的,一番痛苦的纠缠和寻觅后,她才猛然悟到了“家”的意义,“‘家’,我知道了,不管它给人多大的负担,多深的痛苦,人还是象蜗牛一样愿意背着它的重壳沉滞的向前爬。”^{[2]62}这段名言可谓百味杂陈,是方令孺对自己痛苦的家庭经历和矛盾心理的总结,有女性本能的对家的呵护和眷恋,但传递更多的还是家所带来的沉重和苦涩,在坚持中有不堪重负之感。那么,方令孺一生中又面临了哪些家庭困境?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的她又如何一步步艰难地寻找适合自己 and 当下的突围方式?

一

1918年,《新青年》刊发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意识到自己一直按照男性的要求而活,充其量不过是父亲和丈夫的玩偶,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她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娜拉的觉悟和离家举动激励了当时的一批女性知识分子。但民国时期中国的形势比挪威要严峻、复杂得多,“中国的‘娜拉’面前有两道家门:父亲的家门与丈夫的家门。无论从哪一道门出走,都要经过剧烈的内心斗争,心理

上、经济上都要承受沉重的压力,才能迈出一步或半步”^[3]。方令孺也同样经历了父权制家庭和夫权制家庭的双重困境,这两重困境又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对这两道家门,方令孺的感情也有所不同。

(一) 父权制家族的困境:爱与怨交织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氏,1897年生于书香宦宦之家。祖父方宗诚治经学兼治古文,同治年间入曾国藩幕,曾师从族兄方东树(桐城派著名学者),父亲方守敦精于书法、长于诗文,一生不仕。方令孺出生之前,祖父就已病故,族长由伯父担任。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充满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这个家族对年幼的方令孺的压抑突出表现在:不许读书,非打即骂;逼迫妇女缠足;三岁时,就由伯父做主,将她许配给安徽大官僚世家、南京大银行家之子陈平甫。方令孺日后回忆道:“小时是封建家庭轻视的女儿,挨打受骂,身上经常带着青紫的伤痕,读书没有权利,幸福没有权利。”^{[2]113}对此,方令孺也作出了相应反抗,最成功的是,大家族里九个女儿,八个都缠了足,就她没有,可见她小时倔强的性格非同一般。可惜,由于地处偏隅、身处深闺,方令孺与众多旧式大家庭的姐妹们一样,没有勇气也没有意识去反抗不合理的包办婚姻,这种顺从又导致了更深的悲剧。

方令孺七岁丧母,不久,父亲领着四子五女从安庆搬回祖父留下的桐城老宅。脱离了伯父的控制,方令孺开始跟着父亲接受正规的私塾教育,父亲佩服秋瑾,还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并常常同他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藤萝萧瑟的庭院里父亲雍穆而倜傥的风度,寒夜的书斋里父亲白发苍苍灯前垂首的

收稿日期:2017-06-1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14D99)

作者简介:汪黎(1976—),女,安徽宣城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身影，都深深印在方令孺的心上。她在散文《忆江南》中写到：“故乡的庭园里每一片石，每一条径，每一棵古树，每一个残缺浓荫的门，都和父亲的风仪连合着，我想到父亲，就连想到那些醇雅的情景，想到那些情景，就牵记到父亲。”并称这些都是她“一生所最心仪的一切”^{[2]72}。显而易见，方令孺对父亲的风仪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认同，她酷爱读书，不喜应酬的习性可能也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虽为开明人士，但不敢违逆哥哥随意安排女儿亲事的是他，让女儿熟背《女儿经》和《朱子家训》的也是他，依他所言，乃是让女儿变得愚昧，好忘却痛苦，殊不知这样应天顺命反而毁了女儿一辈子的幸福。此外，他将老宅里的树木取上儿子们的小名，虽父爱融融，但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根深蒂固。尽管如此，方令孺还是敬爱父亲的，她日后诉说和批判父权制家族的矛头不是指向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是指向以族长辈父为中心的实际掌控父权的长辈们。

（二）夫权制家族的困境：苦痛与回避

方令孺刚满19岁，就被迫嫁到陈家，而丈夫陈平甫还未满18周岁，新婚伊始，方令孺谨小慎微，相夫教子，夫妻倒也相安无事。1923年，陈平甫到美国求学时带上方令孺同行。在美国，同学孙寒冰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方令孺的女权意识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有觉醒必有反抗，夫妻关系急剧恶化，游学归国后，丈夫另娶外室，住到了上海，并育有一子一女，方令孺继续留守在南京陈家，婚姻从此名存实亡。

关于陈平甫的品行，方令孺从未提及，亲戚朋友也讳莫如深，只有梁实秋曾提到，方令孺“有咏雪才，惜遇人不淑”^[4]。怎么不淑法，梁实秋无心也无力细说。关于婚姻破裂的原因，方令孺日后这样说：“阶级虽同，但又彼此轻视，生活，习惯，思想又彼此矛盾。”^[5]从散文《琅琊山游记》中的一段文字可看出端倪，“常常被家里有一班人骂作呆子，说：‘山上有什么好玩，白纸黑字的书本上又有什么好看，还值得那样一天到晚把时闲耽误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面，弄得家里来一个客人的时候，你总是瞪着眼，不会讲一句客气话，或是陪着客人，陪着尊长来几圈麻将应酬应酬’”^{[2]29}。显见，不善交际，不喜虚俗礼套是丈夫轻视她的一大原因。其次，娜拉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方令孺觉察到自己有着与娜拉类似的命运和困境，她说：“戏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们都是绸子做的傀儡，头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那里扯着他们动一可怜，驯服地被动着！我信，他们的心，一定同我一样，冰冷。”^{[2]13}再者，在美国，不像在陈家凡事有佣人帮衬，照料小孩、家务琐事都得小夫妻自己担着，陈平甫是少爷，方令孺还要求学，一人也顾不过来，稍有不顺，丈夫拳打脚踢的事可能是有的，这是夫妻矛盾激化的导火线。

婚姻虽然破裂，却未正式离婚。是方令孺自愿牺牲、纵容丈夫、坚守从一而终的传统妇道吗？其实，方令孺很不认同日本女子含悲咽泪、对丈夫委曲求全的做法，她说：“日本女子这样牺牲，不是仅仅纵容一个人任性放性的自私心吗？这种自私心要是扩大起来不是徒有害于人类？我可怜她浪费了牺牲精神！”^{[2]55}看来，方令孺是另有苦衷。最主要的还是陈家的阻挠，不排除陈家会用“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夫权观

念及经济来打压她。其次，从方令孺角度来说，“家”的意义已不再只有丈夫，还有三个女儿，爱女之心让她不得不慎重考虑抚养她们的经济压力。再者，夫妻虽反目，婆媳之情尚存，方令孺游学和工作在外，陈家祖母会帮忙照顾小孩，1931年秋，方令孺患甲状腺亢进需长期治疗，陈家也将她视为儿媳接纳。无独有偶，方令孺的胞弟方孝岳也抛弃正妻马君宛（舒芜的母亲），另立外室，马君宛独自抚养儿子，也未与丈夫正式离婚。自己的胞弟尚且这样，难免让方令孺产生“天下男人大抵如此”的失望，离与不离已无关紧要。

夫权制的婚姻家庭，就像一张无形的网，让方令孺觉得窒息，她常“从一群矫情虚伪的大人那里逃开，在玄武湖上沉浸在美丽的黄昏中”^{[2]38}。在作品中，方令孺也经常用“凄凉”“冷寂”“苦痛”的字眼来形容她身处困境的感受。方令孺其实是极恋家的，她曾深情描绘了承载童年和少女记忆的桐城老宅，对重庆北陪那简陋、如船舱似的小房间也依依不舍，作文留恋。但对于南京娃娃桥寓所那个富裕的夫家，她却无只言片语，方令孺对这个家在情感上的态度是回避的。

二

虽然方令孺因种种原因没有斩钉截铁地与旧式大家庭决裂，但并没像弟媳马君宛那样，一生都待在闺中，沉湎在对初婚幸福时光的点滴回忆里，而是为摆脱不幸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心灵阴影和困境，努力寻觅着可行的突围路径。

（一）求学与求职

民国时期，政府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压力，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保护女子在婚姻、教育、职业等方面的权利。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女子求学与求职是合法的、可行的。而方令孺自小就酷爱读书，渴望像男子一样接触更为广阔的天地，她很欣赏侄儿方玮德的说法，“不应当把求学看得太轻，即使丢掉一分钟也是可惜”^{[2]65}。她认为：“一个人是不能久久不登高山，不见大海。”^{[2]48}在这种内心的驱使下，方令孺踏上了求学路。

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阻力就是丈夫，丈夫想拴住和打压她的武器就是经济与孩子。1923年，她随夫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陈家本意可能只是想让足不出户的媳妇见识世面、照顾好丈夫。但方令孺在美国，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和人生价值。1927年，因无法忍受丈夫的欺凌，她带着孩子离开丈夫，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丈夫一怒之下，用减少或掐断经济供给进行施压，致使方令孺和孩子常常挨饿，又因为是带着孩子的已婚妇女，在美国常常受到冷眼和挑剔，在这种困苦的情况下，倔强的方令孺坚持了两年。1929年，丈夫学成回国，索性带走孩子，彻底断绝经济来源，方令孺终因思女心切，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南京丈夫的家。那个年代，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儿媳能在美国坚持求学六年并非易事。

回国后不久，丈夫有了外室，婚姻宣告破裂，方令孺被困在南京的家中，过着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内心非常痛苦、烦闷。她意识到“生活是不能悠闲，要忙，要复杂。小小的园林，养花饲鸟，不是我们这一

代的人所能满足,那里没有创造,没有喜悦,所以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这两个字,同人的生命是织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2]12}。在徐志摩、方玮德、陈梦家等新月派作家的引导下,方令孺开始写诗、写散文,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1930年,经邓叔存介绍,她放弃了优裕的富家少奶奶生活,带着小女儿去青岛大学教书,成为当时国内大学极少数的女教师之一。1931年末,因患甲状腺亢进辞职。上海沦陷前,她带着大女儿到大后方重庆,一人身兼三职:在戏剧学校任教授,在复旦大学任兼职教授,在国立编译馆任编审。1939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她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直到1958年,被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工作让方令孺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实现了自我价值,也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尊重和认可。舒芜说:“九姑(方令孺)在抗战前还住在南京的陈家,在家庭中很有地位,很受尊重。”^{[6]23}

(二)邂逅爱情

丈夫另娶外室的时候,方令孺已年过三十,但仍怀着一颗孩子似的心,玮德称她“虽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一齐飞”^{[2]9}。沈从文也说,“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7]何况方令孺还是美丽的,常任侠曾说“他平生所见到的美人,数九姑是第一”^{[6]22}。一个貌美梦幻的失婚少妇,难免会邂逅爱情。关于方令孺的感情纠葛,有说是与陈梦家,也有说是与闻一多。

陈梦家是方玮德的好友,初见方令孺时,方令孺34岁,陈梦家才20岁,虽然陈梦家随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但从两人通信的频繁及信中的内容、用词和语气判断,不像是长辈与晚辈的对话,而更像是一对恋人。两人在信中文思泉涌、互诉心曲。方令孺在信中说:“今年初夏,在玄武湖上看见你同玮德,都象春花一般的盛年在金色的黄昏中微笑。”“近一个月来因为常常读你的信,教我淡忘了多少眼前的烦恼。这因为你有诗人的温存的性质,当你在那样忧苦不安的时候,写出的话仍是那样的蕴藉。”^{[2]9}陈梦家也将方令孺视为知己,甚至将自己的情感经历也如实相告。《梦家诗集》再版时,陈梦家增加了第五卷“留给文黛”,此文黛自然指的是方令孺。两人虽彼此欣赏信赖,互有好感,若是同龄人,很容易迸出爱情的火花,但14岁的年龄差距如山大,就是现在女子也难从心理上跨过那道年龄的鸿沟。所以方令孺在信中时不时称梦家为“小朋友”,理智地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还原到“九姑”的位置上,爱情最终被转化为友情。

方令孺在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时,闻一多是中国系主任,1931年暑假,闻一多将即将分娩的妻子送回老家,返校后迁住八号宿舍楼。方令孺住七号楼,常向闻一多请教,两人渐生情愫。长期不再写诗的闻一多突然作了一首绝妙的长诗《灵奇》,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所言,这首诗“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8]。方令孺晚年也曾对裘樟松说:“闻一多的诗‘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是写我的。”^[9]方闻之恋并非只是空

穴来风。闻一多是有妇之夫,虽是包办婚姻,但夫妻感情稳定,还有一帮儿女。为了一己私欲,不惜做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第三者,深受传统道德教育的方令孺在心理上难以原谅自己,于是,她只有通过满足大众对失婚女性的审美期待来拒绝刚刚萌发的爱情,《诗一首》明了她的心迹,“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2]129}。闻一多也在内心一番挣扎后,于1932年春,将妻子接回青岛以避嫌。

表面上看,方令孺在爱情上似乎少了份冲动和勇气,太顾虑自己的教养和身份。我觉得方令孺不是有意为有外遇的丈夫守贞操,而是她的生命中未出现那个能带她飞的彼得。不是不想爱,不敢爱,而是不能,最终只能像山岗上的小犊,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2]129}。站在女性视角,我们深深理解她的隐衷。有趣的是,与她同时代的庐隐,先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结婚,郭病逝后,她又拖着女儿嫁给了小她九岁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与庐隐相比,方令孺的爱情追求少了激进和冲动,多了婉约和理性。

(三)珍重友情,广交朋友

爱情可遇而不可求,友情就显得弥足珍贵,方令孺有爱,也需要被爱,不想窝在沉闷的家里,广交朋友就是不错的突围选择。她的作品不涉及婚姻,偶尔谈及爱情,但友情却无处不在。她一生只给四个好友写过悼文,细读四篇悼文,不难发现方令孺所欣赏依重的朋友的特质:真诚热心;爱生命爱生活,充满青春活力;爱人类,有奉献精神。志摩的心是“永远同年青人的心合拢,而以生命注挹的”。志摩具有“温存的性质,肯为朋友间的事尽心,并且他又是那样有兴致有毅力,能同世界的文艺活动衔接”^{[2]1}。方玮德对朋友忠恳,且热爱生命,“是从不屈服或灰心于苦痛的人”^{[2]70}。靳以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孙寒冰爱书如命,具有如乌柏树的红叶一般“光辉灿烂的心”^{[2]137}。

方令孺看重友情,热衷交友,从美国游学归来,常与陈梦家、徐志摩、宗白华、方玮德等人参加南京文德里14号的小文会,一起谈诗写诗。解放初,方令孺在复旦任职,非常好客,只要一回上海,客厅就来客不断,“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10]。对朋友,方令孺真诚坦率,尽心关怀,巴金用“温暖”来形容,“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象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2]序2}。

真诚温暖的友情填补了方令孺失婚后的情感空白,朋友的安慰与鼓励成为方令孺走出苦闷家庭、追求进步的精神支柱。如亦侄亦友的方玮德就常在信中激励她“鼓起沉重的翅膀向高处飞”^{[2]66};复旦时期,方令孺常把心里的话儿说给靳以听;方令孺晚年受到批判,寂寞独守杭州白乐桥时,巴金一家也常来看望她。友谊在她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融“小家”于“大家”

方令孺不喜欢沉闷和单调,渴望变化和变革。她

在给陈梦家的信中说：“这时窗外的乌黑，雷电一阵阵的怒发，我最爱这景象，说不出理由。”^{[2]10}又说：“说也奇，我能忍受极复杂强烈的声音，可是不能忍受一致不变的单调。”^{[2]12}日后，她逐渐忘却个人痛苦，自觉融入时代，支持进步力量，将“小家”困境与整个时代困境相连。这其实是缘于她本心的追求。

三十年代，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与敬佩，她探望并帮助过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丁玲。1937年，在慰问伤兵时，她看着伤兵们在恶劣的治疗条件、生死存亡边缘还保持着活跃的灵魂，心情有种说不出的怜悯与感伤。接着，女儿、侄子们纷纷参军，日军炸毁了桐城老宅，孙寒冰也在敌机轰炸中丧生，她不愿再沉迷在自己的梦里，怕疏忽和错过了这伟大的时代。她融入时代的方式是“我只要毁灭我自己，不留一丝固有的元素存在，然后再生，成为一个原始的，刚强有力的人，不带过往的渣滓，对于一切所谓高雅，神韵，幽深，飘渺，华丽和名贵等等，都不会尝味和醉心，那样才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2]15}。从此她成为大多数人中的一个，也逐渐消磨了自己的女性特征和艺术个性，从女性和艺术审美角度看，无疑是个遗憾，但从方令孺个人角度而言，她却是快乐的。“其实我心里却是快乐的。我确是觉得大时代给我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2]16}上海解放时，她坦言：“我心里的快活，是有生以来所没有感到的，是这样透明的快乐，没有一点渣滓。”^{[2]30}解放后，她整天忙于复旦教授、妇联、文联等工作，巴金称她不再彷徨与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2]序3}。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代女作家苏雪林有着与方令孺类似的婚姻家庭困境，但苏雪林为坚持自己的园地去了台湾，成为多产的知名女作家，方令孺却心甘情愿

地泯灭个性，融入时代的洪流。不管选取何种路径，追随真心就好。

方令孺善良纯真，始终怀着一颗童心，但封建父权制家族和夫权制家庭的双重困境桎梏了她的热情以及对爱的渴求，她的困境也代表了民国时期大多数妇女的困境。由于当时文化背景的制约，方令孺的主要突围策略还停留在“像男人一样”的思维模式中，忽视了自己的女性特征。但她不甘被困，利用现有条件努力突围、实现自我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与当时大多数妇女相比，她的突围是勇敢的、成功的。而且，经济与事业独立、有自己的社交圈、关爱他人也是当今女性走出困境、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主要方式，方令孺的突围策略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苏雪林. 苏雪林散文[M]. 张昌华, 选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290.
- [2]方令孺. 方令孺散文选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3]刘思谦. “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4.
- [4]梁实秋. 雅舍忆旧[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04.
- [5]龙渊, 高松年. 方令孺散文选集·序言[M]//方令孺. 方令孺散文选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2.
- [6]舒芜. 舒芜口述自传[M]. 许福芦, 撰写.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7]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148.
- [8]梁实秋. 梁实秋文集: 第2卷[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544.
- [9]裘樟松. 方令孺先生轶事[J]. 点滴, 2010(2): 72.
- [10]吴中杰. 海上学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01.

(责任编辑 聂根兰)

(上接第43页)

3. 习俗保护要亲民

习俗凝练内涵、创新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被大众接受。任何思想文化，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本身再好，“也是不起作用的”^[7]。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各级非遗项目的申报呈现火热状态，随着端午、24节气进入世界级非遗名录，中国传统节日习俗逐步进入世界视野，这更是激发人们对传统习俗的研究和申报的热情。然而现实状态是专家研究、政府参与较高，民间热情较低，这一冷一热状态反映了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上面临的尴尬局面。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民间的作用，“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才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8]。因此，传统习俗与现代社会融合，要通过内涵凝练和形式创新来实现，让民俗在民间生活落地生根，这才是保护民俗文化的长久之计。

三、结语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要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大力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相关联的文化产业。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宣传和引

导，倡导传统文化产业化；各社会团体要深入群众生活，创造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体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文艺精品；借助非遗保护之力，全力打造群众参与程度高的民俗文化空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传统节日的积极性，使传统节日以新颖的方式回归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在生活实践中得到传承发扬。

参考文献：

- [1]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第6版[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541.
- [2][美]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 吕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21.
- [3]覃光广, 等. 文化学辞典[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339.
- [4]季羨林. 季羨林谈文化[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172.
- [5]费孝通. 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190.
- [6][美]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131.
- [7]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5.
- [8]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432.

(责任编辑 聂根兰)